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0.02.002

多边平台助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机制与效能

刘家明, 蒋亚琴

(江西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 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多边平台活跃在官方疫情防控工作总结和未来工作布局中, 基于其水平联结机制、平坦运行机制、整合协同机制、供需匹配机制四大机制助推疫情治理, 取得了民众对疫情恐慌的缓解、多元主体合力抗疫、政府内部联防联控、医疗及生活物资供给等治理效能。多边平台已然成为此次疫情治理的“生力军”, 基于多边平台的治理研究对于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应对此次疫情“大考”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多边平台; 助推; 平台型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 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 (2020) 02-0010-08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其传播速度、感染范围、防控难度可谓前所未有的, 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那么, 面对“大考”, 我国“作答”成绩如何呢? 从全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变化来看, 从最高的 15152 例 (含湖北临床确诊病例 13332 例) 到“首次跌至 2000 例以下”、“首次降至三位数”, 再到“首次降至两位数”、“多地单日 0 确诊”, 最后“中国本土病例零新增”。可以看出, 疫情形势稳定向好, 推动全国范围内日益升腾起抗击疫情必胜的信心, 同时也赢得了国际组织和多国政要的高度认可。那么, 助推我国疫情治理获得上述阶段性成效的要素有哪些? 能否成为接下来疫情治理持续发力的着力点?

查阅疫情发生以来的官方媒体文章和政府官员讲话可以发现, “平台”可谓高频词, 活跃在政府官员、学者、新闻媒体工作者对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总结和未来疫情工作布局安排中。在中央疫情治理层面: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文通知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建立诊疗平台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服务管理平台^[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要搭建起民生期望与企业责任沟通互信的平台来保障疫情期间民生商品不涨价不断供^[2];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司长陈越良强调要发挥社交平台在基层社区防控中的作用^[3]。而在地方疫情治理层面, “平台”的“出镜率”更高: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调研指导工作时指出要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平台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撑作用^[4]; 上海市药品监管局充分利用“一网通办”平台实现政务服务“全程网办”^[5], 并搭建“发热咨询平台”, 汇集医学专家 24 小时线上解疑^[6]; 浙江

收稿日期: 2020-0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6XZZ015); 校级学术学位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XS2019-S050)

作者简介: 刘家明 (1981-), 男, 湖北安陆人,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多边平台与平台型治理; 蒋亚琴 (1995-), 女,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平台型治理。

省上线的“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囊括八大疫情防控功能^[7]等等。与此同时,其他社会主体也借助平台助力疫情防控,如腾讯表示将会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能力为疫情发生地区提供帮助^[8],再如志愿者通过“学习强国”平台、“文明武汉”公众号申请加入防疫志愿服务队^[9]。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公益组织及个人,各类“平台”行动活跃,赫然成为此次疫情治理的“生力军”。

多边平台这一概念起源于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irole等人于2003年提出的“双边市场(平台)”,即通过把两类或多类用户群体吸引至平台并让其直接互动合作而创造价值的支撑载体和互动结构。上述所列举的各类“平台”均符合这一概念定义,因而都属于多边平台。进入21世纪后,搭载互联网技术的多边平台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并席卷全球,平台革命引爆,平台时代来临,多边平台成为一种新的组织范式与治理模式^[10]。一些公共组织也开始借鉴多边平台探讨公共治理^[11]与公共服务^[12]及智慧城市建设^[13],我国一些学者也表示多边平台是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14~16],有利于实现公共品的多元供给与公共服务的协作创新^[17]。

多边平台能否应用于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治理?其实早在2012年Maine就指出多边平台模式对公共卫生优化具有重要意义^[18],而从上述所提及的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及个人等主体通过构建平台或借助已有平台助推疫情治理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多边平台的价值。“大考”还未结束,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解题”还要继续,因而有必要挖掘和剖析多边平台在疫情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治理效能的具体体现,以总结出来的积极经验助推接下来疫情治理工作的更好开展。

二、多边平台助推疫情治理的机制

本文所提及的多边平台为一种治理模式,它对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助推主要基于其具有的四大机制:水平联结机制、平坦运行机制、整合协同机制、供需匹配机制,这四大机制相互赋能、共同作用,是多边平台助推疫情治理的强大支撑。

(一) 水平联结机制

多边平台是一种具有水平特征的联结机制,它的核心要义是创建一个水平性的互动系统,从想创造什么样的产出或效应开始,把网络上各节点横向联结起来,各节点相互配合、彼此赋能,为完成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奋斗。这不同于传统科层组织的基本逻辑,即等级分工和专业分工构成的“小方格”框架,如此难逃上下层级之间的“隔热层”和部门之间的“部门墙”^{[19]5-8}。层层分权、等级分明使得员工的工作范式限于对上级领导的负责,对于被服务者的需求则反应滞后,而过度强调部门职能的分工,也会导致部门横向协调成本过高,且易陷入推诿扯皮的窠臼。结果是企业和政府管理在科层制逻辑下呈现服务碎片化和空心化,整体运作效率低下。平台被视作区别于传统科层组织的新型组织,有利于突破组织边界^[20],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市场或行业组织形式^[21]。多边平台的组织逻辑在于,以被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向,将组织内部主体和要素进行最优化组合,去中间层,打破部门墙,推动组织极致扁平化、极致柔性化以形成组织对外的极致应变力。对于企业来说,多边平台的这一机制能使得企业对市场顾客需求反应更为敏锐,运作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对于政府来说,多边平台的水平联结机制能推动政府以人民需求满足、人民利益最大化的共同目标而整体协作,推动政府从分散走向集中,从破碎走向整合,最大可能地避免职能交叉和利益冲突。

(二) 平坦运行机制

从语义上理解,所谓的“多边平台”一定是“平”的。“平”的原意最初为实体空间场所、物理设施、物体的表面平坦均匀,被应用到社会领域后,“平”则释义为公平、正义、平等,强调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相互之间不能强制、压迫,再后来,“平”被赋予更为抽象的内涵,即组织的扁平

化、机会的均等、程序的公平、规则制度的不偏不倚、结果的公正等。这些“平”的涵义在多方平台皆有所指，但是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且平台所有者属性（政府、企业、公益组织）的不同也决定了不同平台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不管平台属性为何，多方平台的运行始终贯彻平坦、通畅机制，平台内各资源是自由流动的，各主体的进入没有歧视性门槛，用户群体入驻平台后享有平等的参与权与话语权，平台尊重每个个体、每个选择、每个发声，同时用户群体的退出也没有不利障碍。而检验平坦性的标准之一就是信息透明^[22]，信息若不透明，则平台不可称之为平台，而为黑箱。

（三）整合协同机制

多方平台犹如一个杠杆，撬动了各方的资源和能力，实现生态系统群体间资源与能力的联结与整合，扩展了组织原本有限的资源与能力，为无障碍协同合作夯实了基础。于企业而言，平台时代合作和共同创造比竞争更重要^[23]¹⁸⁹，互动合作成为适应新时代的新准则，单一企业孤军奋战已然不适应平台时代的发展大势。于政府而言，多方平台的整合协同机制意味着政府要动员外部一切社会主体和要素，实现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对公共事务的协同共治和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当多元群体间缺乏合作机制，或者互动、合作的交易成本过于高昂时，当公共服务需要多元供给与创新时，多方平台是必要的^[24]，它是政府整合多主体、多要素协同共治最佳的工具选择^[25]。

（四）供需匹配机制

平台是匹配者，是促进供需进行价值互动的结构，它的首要任务是匹配供需，而互动与促进互动是平台实现供需精准匹配的基础过程。这不同于传统的买入卖出的管道结构模式，管道结构是一步一步地创造价值的过程，供应者在管道的一端，需求者在管道的另一端，管道所有者像守门人那样管控供应到需求的价值传递，把控互动的结构。但是多方平台消除了传统“守门人”，不控制互动的结构，不享有生产者的剩余索取权，如制定价格、生产规格、运营方式，而是促成供需用户之间的直接互动并为其互动提供服务、工具、规则和空间、渠道以保证互动质量。这个过程具体为：平台吸引和汇聚供需两侧的用户，通过平台内部的信息机制、筛选机制对用户进行精准匹配，并通过提供一揽子服务确保供需双方互动，最终平台在推动供需双方高质量匹配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26]。在这个过程中，多方平台必须确保供需两边都有足够数量的参与者，他们都能够从另一方参与者的聚集中获益，并且每一方都有另一方参与者想要与之互动的大规模参与者，这就要多方平台在发展初期不过分谋求入驻用户数量，而是更加注重保障已经入驻用户的体验。

三、多方平台提升疫情治理的效能及比较

基于以上多方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多方平台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产生了哪些效能，而不同种类的平台在其中又发挥了何种效能，这是接下来要重点分析的问题。

（一）平台的治理效能及其转化机理

1. 保障疫情信息的公开透明，助推民众对疫情恐慌的缓解

民众情绪的疏导和社会心态的稳定是疫情治理的重要环节。疫情爆发初期，整个社会公众尚未对疫情具有初步认识，各种谣言肆意流淌。形形色色的谣言，搭载似是而非的语言、后期处理的照片、剪辑拼凑的视频，挑拨着精神本就高度紧绷的民众。而谣言产生的本质在于疫情信息的不透明及权威信息传播的滞后，与此同时所谓的小道消息满足了民众迫切打探消息的需要，越是恐怖离谱的消息越能得到民众的关注。信息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一个高速传播节点，谣言呈指数增长。权威消息和谣言从来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疫情发生期间，多方平台充分发挥了其平坦透明的机制，帮助权威消息跑在谣言的前面，同时扩大了权威消息的传播面，各类信息公开透明，群众恐慌得以缓解。

搭载微信社交平台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早在2020年2月3日就开通上线了“疫情防控”专栏,任何个人和组织可以无壁垒地进入并获取国家卫健委统计的实时数据。同时全国60%的省份都整合了自身政务服务移动端平台,发布中央、各省市的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一些企业和个人可以无壁垒地进入这些掌握核心信息资源的政府多边平台获取开放数据,并基于此开发上线自身的疫情防控平台。商业平台具有强大的聚拢用户能力和内容分发能力^[27],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数据监测及可视化呈现、信息整合和即时辟谣等优势^[28]。如腾讯、阿里巴巴、新浪微博等公司都开通了疫情信息服务入口,及时跟踪、整合政府网站及政府发布会的消息,做权威消息的“搬运工”。其中腾讯还上线了可精确到社区的疫情地图“疫况”;360公司、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狗搜索等通过人工智能收集官方疫情信息,均上线了新冠肺炎患者同程查询工具。这些基于政府多边平台核心数据资源所开发的平台,让权威信息快速下沉,对谣言形成强大压制,修正了民众对疫情的错误认识,引导民众树立坚定信心,缓解民众对疫恐慌。

2. 改变政府单打独斗模式,助推多元主体合力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是政府内部的事务,一元性的疫情治理会导致具有强烈参与意识的组织和个人沦为“局外人”,极易导致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社会情绪的波动,且政府单打独斗难免顾此失彼。要想高效应对安全危机,必须探索出一种政府协同其他主体共同治理安全危机的管理机制,改变主体单一化的局面^[29]。多边平台意味着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供给,既有助于提升政府的领导力^[30],又有助于推动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平等参与、权力共享、协同联动。在此次疫情治理过程中,多边平台激发了社会各主体参与疫情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了政府、企业、公益组织、个人等资源与能力的连接共享,彰显了党的统一领导角色、媒体的宣传引导角色、企业(平台型企业)集聚与开发角色、公益组织动员角色,突出了公民意识与创新精神,由此形成联防联控的疫情治理态势,将疫情治理落实到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人,形成全民参与战“疫”。

以腾讯“为村”平台为例,该平台联结了村民自治组织、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组织、村民以及社会各界愿意为农村奉献的企业和个人,各主体基于“为村”平台自由平等交互。村民可以基于“为村”平台表达疫情疑问焦虑、反映正当需求、提供疫情线索、提高科学抗疫意识、参与农村抗疫行动;村干部可以基于“为村”平台高效落实疫情工作布局,组织动员村庄“能人”、党员、志愿者;地方政府可以基于“为村”平台观察村庄抗疫工作动态以及疫情现状,并高效普及推送准确的疫情权威信息;农村外部主体可以基于“为村”平台及时补足农村抗疫薄弱环节,如医生进入平台为农民免费提供医疗救助。如此,“为村”平台围绕筑牢农村抗疫防疫联结起各主体的资源、禀赋优势,群策群力,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村抗疫生态系统,激发出农村抗疫的内生动力,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就鼓励全国各县乡村抗疫要充分利用腾讯集团的“为村”平台。

3. 实现政府内部横向协同,助推政府内部联防联控

对疫情的关注和应对要形成全国抗疫一盘棋,以跨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实现多部门的高效协同。然而,从疫情防控的实践来看,不同省份、地市差异很大。一些部门之间数据、信息传递不畅,产生责、权、利的冲突,联动效果差^[31],极大消耗了基层干部抗疫的精力和时间。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地区的抗疫指挥系统不完整不科学,各部门之间没有形成统筹协调机制,数据多头采集却难归集,跨部门数据共享程度不够,跨业务协同支撑力度不足^[32]。而多边平台可以帮助公共部门建立内部价值网络,将公安、交警、民防、武警、医疗救治、宣传等相关部门纳入到一个共同的交互平台,各个机关所采集的信息迅速传递到统一的公共平台,避免了相似信息的重复采集,同时基于多边平台尤其是互联网平台(政府自建或互联网平台企业)实现便捷的信息交流,拆除政府体制中条块分割的壁垒,使各部门能围绕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最大利益实现优化组合、资源集成共享和行动协调配合,共同提供更为整体化的服务。

如杭州市依托新型城市治理平台“城市大脑”搭建的“卫健警务——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系统”，共享、整合卫健委、公安等各部门数据，融合交通枢纽、疾控、医疗、出行等80多个维度的大数据，基于多源数据融合共享搭建高危易感染人员模型，高精度锁定确诊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有关政府部门可以借助平台了解每天疫情重点区域到杭人员，便于早期介入、动态管理，形成快速灵活综合调度体系。

4. 匹配物资供给与运输，助推医疗及生活物资供给

多边平台最大的功能是供需的匹配，一些学者指出“只有平台才能在供给侧纳入各类资源，在需求侧满足用户的各类需求”^{[19]XVII}。而多边平台在疫情治理期间的供需匹配作用主要体现在医疗物资的供需、生活用品的供需以及物资和运输车辆的匹配上。

首先是医疗物质的供需匹配。疫情发生前期，全国各地驰援武汉救援物资，民间爱心捐赠不断，数量庞大，然而武汉抗疫一线依然不断发出物资告急公告。由于捐赠前期缺乏沟通交互，所捐赠的医疗物资难以精准对接抗疫一线迫切所需。多边平台的使用改变了调配医疗物资依赖统计单位层层上报数据和人工估算的粗放管理模式，医院需求方可以基于平台发布物资需求，而个人和企业可以通过平台查找需求并快速响应需求方。此类平台有腾讯的“数动物资供需平台”、海尔“工业互联网平台”、“防控物资紧急采购需求发布平台”、京东“应急资源信息发布平台”等。其次是生产用品的供需匹配。针对一些特殊群体，如所住小区被封的居民，其巨大需求的供应匹配，或由社区工作人员基于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收集居民需求进行统一购买、供应，或由京东、盒马鲜生、每日优鲜等电商平台的快递速运进行供给。最后是物资与运输车辆的匹配。蔬菜种植户、家禽养殖户、工厂生产企业等急需车辆运输物资的用户可以基于平台发布货物运输信息，而具备疫情防控车辆特别通行证的车主和运输企业可以根据货物运输信息无障碍与需求方沟通，从而实现物资与车辆的快速匹配，青岛“货物和车辆运输保障服务平台”就充分发挥了这一作用。

（二）不同平台的治理效能及其比较

疫情发生以来，不同平台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优势，在疫情治理中找准“用武之地”，形成了对疫情的全方位治理网络。根据平台所有者的身份，我们将多边平台大致分为政府多边平台、企业多边平台、公益组织平台，并根据这三大类平台不同的判定标准对疫情治理中有所应用的平台进行整合，然后再基于平台的主要创价模式进行二次分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个人平台也属于一大类，它的判定标准依据企业平台，因为个人平台也涉及吸引用户群的问题，如个人可以经营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一旦关注粉丝、文章阅读、点赞评论超过一定数量，则个人也可以在平台进行广告销售。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个人平台也在疫情权威消息传播、安抚社会情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考虑到大多数个人平台均需内嵌到企业大平台中，基于一些超级平台来发挥作用，因而这里不单独分列。此外，平台为增强用户粘性，扩大用户规模，都会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开拓自己的业务，也就是说，平台的功能呈现多维性。但一个平台的属性定位主要看其主要创价模式，即在平台获利的关卡中处于核心位置并影响其他价值关卡的实现，则该关卡的性质决定平台的命名和类型。对疫情治理中涉及的平台分类主要依据平台的主要创价模式，具体整理情况如表1。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进入了以个体为基本推动力量的3.0时代，更多地方的更多主体能够进入平台开展广泛的互动合作。每种合作方式要么是由平台直接造就，要么在它的推动下得到强化，平台将会

表 1 不同平台的治理效能及其比较

平台属性	政府多边平台				企业多边平台					公益组织平台
判别标准	公共性、平坦性、公平性、开放性、互动性 ^[22]				倾斜式定价、群体间网络外部性、合约控制权 ^[33]					同政府(但主体为非公组织)
平台类型	政务服务平台	官媒平台	物资匹配平台	监督平台	电商平台	媒体平台	网络社交平台	医疗服务平台	办公平台	公益慈善平台
业务范围	宣传政策、办事服务、发布实时动态	宣传政令政策、传播信息知识、引导舆论	物资与车辆的匹配、物资在不同医院的分配	接收群众举报、公布捐赠物资及使用	B2B、B2C、跨境贸易服务	发布信息、传递知识、引导大众	互动交流、交友、免费不限时长音视频	健康评测、预防保健、康复指导、科普卫生习惯	不限时长的音视频会议、工作通知	扶贫救灾、医疗救助
治理效能	实现政务网上不接触式一站式办理	发布权威信息、回应民众关切、消除恐慌	优化医疗物资供需匹配效率	保证捐赠公开透明、打击哄抬物价	稳定物价、协调全球物资、保障供给	预警、辅助传播权威信息、查询疫情、监督检举	监督检举、交流互动、传播疫情信息	健康评估、居家观察指导、引导就医、减轻医院门诊压力	助力复工复产、保障经济稳定	方便企业与民众捐赠款物、筹集物资
平台举例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14个地区政务服务平台	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学习强国、新华社客户端	国家重点物资保障平台、“货物和车辆运输保障服务平台”	“请您监督”、小程序“疫情督查”	淘宝、京东、盒马鲜生、每日优鲜	微博、腾讯、网易、凤凰网、搜狐、微信公众号	微信、QQ、抖音、快手、微博	丁香园、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阿里健康、京东健康	轻推、腾讯会议、云视讯App	腾讯公益、微公益平台、支付宝公益、红十字会

“处于一切事物的中心”^[34]。多边平台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极大地提高了平台的覆盖面、扩张速度，激发了网络效应，提高了用户群体交互质量，降低了平台内互动成本，使得多边平台具备了颠覆政府-市场-社会的革命性力量，多边平台得以席卷公共领域、商业领域的每个角落。此次疫情治理中多边平台作用的发挥也验证了我们已进入平台时代，迎来了平台型社会。

在平台型社会的大环境下，只有构筑与多边平台相适应的平台型治理模式，才能顺利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公共服务创新供给与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一方面，面对商业平台的发展，政府要作出有效的回应，这需要政府在监管、制定政策方面作出调整，如疫情发生至今国家卫健委就三度发文强调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的作用，作出具体指导，并完善了平台的医保报销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具有信息密集、机构分散、信息不对称等容易发生平台革命的多个条件^{[23]279~286}。新冠肺炎疫情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得公共事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难度增加，政府依靠自身有限的资源与能力难以应对，需要联合市场、社会的力量进行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并且，社会协同治理格局的落地最终取决于主体和机制层面的平台建设^[35]，平台模式能够使政府疫情治理流程更加透明、政府回应性更加友好和迅速、公共服务更富于创新。因而，商业平台的发展以及政府疫情治理面临的困境推动了此次疫情的平台型治理。

所谓新冠肺炎疫情的平台型治理模式指的是在开放基础设施、政务数据等资源，共享话语权、生产经营权、监督评价权、决策权等基础上，通过平台的互动机制、网络效应、创价模式，将外部的供需主

体、相关治理主体联结在一起,通过推动其良性交互、相互赋能、合作共赢,来实现多元协同治理、服务协作创新。以公益平台武汉红十字会为例,疫情发生以来,其在分发送全国所集聚的捐赠物资时效率低下,受到全国人民大众的质疑,之后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的指导下,武汉红十字会将平台开放,吸引专业的市场和社会力量进驻,民营医药流通企业九州通与武汉城投、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统计局、邮政协调配合,最终实现捐赠物资的高效运转。

(二) 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的平台型治理要想在未来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效能,根据已有多边平台的表现,需要从以下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树立政府的平台战略观。多边平台能否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有所应用并产生积极效能首先就在于政府是否具有顺应平台时代发展的平台战略观,这种战略观能推动政府积极构建政府多边平台,自身基于多边平台实现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与公共治理目标的同时,也能制定适应平台时代发展的政策支持平台型企业发展。政策扶持是平台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为此政府要从政策层面推动平台型企业的发展以及对政府多边平台的建构给出具体指导。

二是扩大平台的开放共享程度。多边平台的互动合作空间扩大,创造的价值潜力随之增强。为此,政府要与外部主体共享公权力,基于平等、信任、开放、共赢的价值观,对市场、社会主体赋权释能,将决策权、服务经营权、资源配置权、基础设施使用权、监督评价权对外进行开放,吸引多边用户群体经制度化渠道自由进入到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来。

三是加强网络信息技术的建设。多边平台和网络信息技术没有必然关联,如传统的广交会符合多边平台的判别标准却没有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但一旦多边平台搭载网络信息技术,网络信息技术的实时便捷就能最大程度降低平台内信息搜集成本、交互合作成本和平台监督成本,改进平台的服务流程和服务体验,强化平台的透明度和平坦度,增加用户群体交互频率,提高平台运行效率。新冠肺炎疫情的平台型治理要想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得以快速推广,需要网络信息技术的助力,尤其是在乡村地区的疫情治理工作中,需要乡村地区的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EB/OL].<http://www.nhc.gov.cn>, 2020-02-07.
- [2] 市监总局:保障防疫用品重要民生商品不涨价不断供[N].人民日报, 2020-02-06.
- [3] 中国新闻网.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六问六答[EB/OL].<http://www.chinanews.com>, 2020-02-10.
- [4] 南方新闻网.广东“数字政府”支撑疫情防控工作[EB/OL].<http://baijiahao.baidu.com>, 2020-01-31.
- [5] 人民网.上海市药品监管局“全程网办”助力疫情防控[EB/OL].<http://sh.people.com.cn>, 2020-02-08.
- [6] 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发热咨询平台上线十天咨询四千余人次 逾百位专家解答市民疑惑[EB/OL].<http://www.shanghai.gov.cn>, 2020-02-10.
- [7] 李中文, 窦瀚洋.浙江精准分析疫情 智能高效防控[N].人民日报, 2020-02-11.
- [8] 腾讯:全方位驰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N].经济日报, 2020-02-06.
- [9] 人民网.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武汉市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关爱行动”通过“学习强国”APP和“文明武汉”公众号报名[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 2020-02-10.
- [10] Sangeet Paul Choudary, Marshall W. Van Alstyne, Geoffrey G. Parker. Platform Revolution[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 2016.
- [11] Chris Ansell, Alison Gash. Collaborative Platforms as a Governance Strategy[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7, 28(1):16-32.

- [12] Marijn Janssen, Elsa Estevez. Lean Government and Platform-based Governance-Doing More with Les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3, (30):1-8.
- [13] Walravens, N., Ballon, P. Platform Business Models for Smart Cities: Form Control and Value to Governance and Public Value[J].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2013, 51(6):72-79.
- [14] 丁元竹. 积极探索建设平台政府,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6, (6):1-5.
- [15] 陶希东. 平台经济呼唤平台型政府治理模式[J]. 浦东发展, 2013, (12):36-39.
- [16] 刘学. 重构平台与生态: 谁能掌控未来[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17] 刘家明. 公共平台建设的多维取向[J]. 重庆社会科学, 2017, (1):29-35.
- [18] Lucinda L. Maine. Viewpoints: Optimizing the Public Health Platform[J]. 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2012, 76(9):1-3.
- [19] 穆胜. 释放潜能: 平台型组织的进化路线图[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8.
- [20] 蔡宁伟. 自组织与平台组织的崛起[J]. 清华管理评论, 2015, (11):70-76.
- [21] 韩沐野. 传统科层制组织向平台型组织转型的演进路径研究——以海尔平台化变革为案例[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7, (3):114-120.
- [22] 刘家明. 公共平台判别标准研究: 双边平台界定标准的引入[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8, (5):116-121.
- [23] 杰奥夫雷 G. 帕克, 马歇尔 W. 范 埃尔斯泰恩, 桑基特 保罗 邱达利. 平台革命: 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M]. 志鹏,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 [24] 陈威如, 余卓轩. 平台战略[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279.
- [25] 刘家明. 平台型治理: 内涵、缘由及价值析论[J]. 理论导刊, 2018, (8):22-26.
- [26] 亚历克斯·莫塞德, 尼古拉斯 L. 约翰逊. 平台垄断: 主导 21 世纪经济的力量[M]. 杨菲,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29.
- [27] 范以锦. 商业平台: 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不可忽略的力量[J]. 新闻与写作, 2019, (6):59-62.
- [28] 栾轶玫, 张雅琦.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信息呈现与媒体表现[J]. 新闻战线, 2020, (3):12-15.
- [29] 王树文, 韩鑫红. 政府协同治理安全危机双重整合机制及政策建议[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 (12):85-88.
- [30] Tim O'Reilly.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J]. Innovations, 2010, 6(1):13-40.
- [31] 唐伟勤. 我国城市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模式探讨[J]. 中国行政管理, 2008, (3):79-82.
- [32] 蔡剑. 协同创新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54.
- [33] 傅联英, 骆品亮. 双边市场的定性判断与定量识别: 一个综述[J]. 产业经济评论, 2013, (2):1-18.
- [34] 托马斯·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 21 世纪简史[M]. 何帆, 肖莹莹, 郝正非,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 [35] 欧黎明, 朱秦. 社会协同治理: 信任关系与平台建设[J]. 中国行政管理, 2009, (5):118-121.

(责任编辑: 卢 君)